

p. 26973.

- ⑤···"Cabinda: Jungle Jigsaw," op. cit., p. 31.  
 ⑥···"Angola: An Exile Speaks," op. cit., p. 31.  
 ⑦···Nicholas Ashford, "Angolan Nationalist Leader Sees Tide Turning in His Favour," op. cit., p. 6.  
 ⑧···"Angola: A New Way of Life,—and Death," op. cit., p. 20.  
 ⑨···"Angola: Explosive Cargo," op. cit., p. 30.  
 ⑩···Nicholas Ashford, "Arms Race Among Rival Factions Turns the Angola Conflict into An International Issue," op. cit., p. 6.  
 ⑪···"Angola: Intrigue, Continued," To the Point (July, 12, 1975) Vol. 2, No. 14, p. 25.  
 ⑫···"Angola: Exile Speaks," op. cit., p. 31.  
 ⑬···中國時報(民六十四年九月廿五日)。

## 「九、卅政變」後蘇聯與印尼之關係

張均然

### 一 關係的解凍

過去，蘇聯對親共的印尼蘇卡諾政府在經濟及軍事上大量援助，在政治上盡力拉攏，兩國交往頻繁，關係至為密切。但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印尼共產黨政變流產後，蘇卡諾政府倒台，蘇哈托代之，採取反共政策，全力清剿印尼共產黨，並與毛共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凍結外交關係。至於蘇聯，雖與印尼仍維持外交關係，但兩國貿易量已銳減，蘇聯經技援助的建廠計劃已停止，蘇聯原欲在印尼安汶島(Ambon Island)建造的海軍基地，也僅止於海底的勘察，印尼政府亦不再派遣學生及技術人員前往蘇聯研究。

自一九六九年始，國際情勢多變。諸如：毛蘇關係的惡化，毛共展開笑臉外交，尼克森宣佈和解政策圖謀與毛政權接觸，在在促使蘇聯極力向東南亞地區擴大其政治與經濟的攻勢。

一九六九年初，蘇聯對印尼的政策已有重大改變。印尼政府仍繼續執行反共政策，但克里姆林宮不再責罵印尼政府是法西斯主義者，且轉而盡力改

善與印尼之關係。蘇聯於同年派往印尼的新大使<sup>①</sup>，並保證不干涉印尼內政。

一九七〇年三月及八月，印尼外長馬立克兩度訪問莫斯科，與蘇聯官員簽訂一項協定，重新安排印尼在蘇卡諾時代所欠的七億五千萬美元債款，改以三十年為期償還。此外，一個由二十六人組成的蘇聯技術代表團，由莫斯科化學學院副主任S. D. Evanchik率領，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底與九月初分兩批抵達雅加達，作兩個月的停留，以考察恢復兩項蘇聯援助建廠工程的可能性(印尼已拒絕恢復這兩項工程，本文後面將提到)。這兩項工程是由於九、卅政變後被印尼政府擱置的，一項是位於中爪哇Tjilatjap的磷肥工廠，另一項是位於雅加達西部五十英里，在Tjilagon的鋼鐵廠，政變當時，這兩個工廠的工程已完成四分之三。

在印尼國內方面，自一九六七年實行新投資法，日本、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資金遂不斷湧入，這對於穩定與繁榮印尼國內經濟雖有很大的貢獻，但印尼部份人士認為僅與西方國家保持密切的經濟關係，將危及印尼的不結盟政策。此等意見為蘇聯製造了與印尼接近的機會。當時莫斯科聲言：

「所有這些事件證明印尼部份人士是對的，他們看到在對外關係上採取單向政策及在國際事務上放棄獨立立場的嚴重危險性。……印尼政治階層不斷的理解到，近年來削弱了與社會主義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使印尼在國際政治上已遭到孤立的危險。」②

## 二 政治關係

莫斯科利用雙方代表團及重要官員互訪的機會，隨時強調此一「單向」政策的危險與不利，同時表示蘇聯願與印尼改善關係。例如，一九七三年五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曾接見印尼國會代表團，對雙邊關係及「其他互相關心的問題」進行了「熱烈而友好的」討論③。莫斯科電台聲稱這「不只是禮貌上的訪問」。它說：

「印尼方面很有興趣調整、擴展及加強與蘇聯之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再加以說明的是印尼代表團成員的興趣在蘇聯領導人物中得到了答覆……：在符合蘇聯與印尼人民利益的基礎上，現在有恢復我們兩國友好關係與密切合作的真實機會。」④

印尼代表團團長Domo Pranoto在回國後稱，蘇聯有很大興趣恢復與印尼的密切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他說蘇聯領導者沒有提到印尼拘押共產黨員、對印尼共產黨的禁令或印尼與毛共關係等問題。他說雙方對促進經濟合作與技術援助會作有益的討論⑤。

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八人代表團，由最高蘇維埃副主席K.A. Khalilov率領答訪印尼，曾與印尼總統蘇哈托、外長馬立克及其他多位政府官員會談。根據蘇聯「消息報」的報導，代表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經由國會加強兩國之接觸」⑥。

此外，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已故的蘇聯文化部長Furtseva到印尼參加在Togakarta舉行的一項國際會議。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至十日，蘇聯副外長Firyubin訪問印尼六天，與印尼總統蘇哈托及外長馬立克曾有廣泛的會談。據Firyubin表示對會談結果感到滿意，並稱此行對加強及擴大蘇印合作很有益處⑦。

經過雙方官員的多次互訪，蘇印關係在某些方面雖稍為改善，但在主要

問題上，雙方仍有極大的歧見。

蘇聯對印尼提出警告，謂毛共顛覆東南亞地區對印尼構成威脅。印尼對這一警告毫無疑問的也有同感，但印尼政府拒絕支持蘇聯所提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事實上，印尼是一九七一年吉隆坡中立宣言的主要倡議者，它反對任何外來勢力在東南亞協約(ASEAN)領域的擴張。蘇哈托總統聲稱：「我們要東南亞協約加強地區獨立性並避免使這一地區變為區域性的戰場，因此我們就自動拒絕布里茲涅夫主義。」他所指的就是一九六九年蘇聯首次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⑧。一九七四年三月蘇聯副外長Firyubin訪問印尼後，印尼外長馬立克仍然指稱蘇聯這一提議含混不清，雖然他的語調不像以前印尼的一般評論那樣含有敵意。

在另一方面，蘇聯沒有支持印尼與馬來西亞所提出的領海範圍為十二海里的要求，以及兩國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所提出的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不是一條國際水道(International Waterway)的共同聲明。印尼與馬來西亞發表此一共同聲明的動機，除了考慮到海峽的航行安全與可能污染的問題外，毫無疑問的還考慮到蘇聯海軍在麻六甲海峽活動的增加，同時聯想到蘇聯海軍力量在印度洋與在東南亞的全面企圖。當時蘇彝士運河仍舊在關閉中，蘇聯船隻從海參崴啟程赴印度洋及返航時，均須經過麻六甲海峽。一九七二年三月廿四日，馬來西亞外交部祕書長Zaiton Ibrahim發表聲明，申述了印尼與馬來西亞對這一事實的憂慮。他說：「我們主要關心的是保證海峽的使用不會危及我們的安全與我們人民的生活。」⑨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日，蘇聯透過其駐日大使Toyansky的談話，聲稱蘇聯認為麻六甲海峽是一條國際水道，「必須開放讓外國船隻自由通行」(印尼與馬來西亞允許國際船隻無害通行)。接着，蘇聯派遣巡迴大使L.I. Mendelevich前往雅加達與吉隆坡，企圖說服這兩個國家重新考慮所發表的共同聲明，同意海峽國際化與把領海範圍從十二海里減至三海里。不過，印尼與馬來西亞堅持原先的立場。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印尼對蘇聯兩艘軍艦通過麻六甲海峽，聲明「感到遺憾並且加以責難」⑩。一九七四年三月蘇聯副外長Firyubin訪問印尼時，據說曾表示蘇聯「尊重」印尼的立場。這顯示蘇聯雖然重視此一海峽的戰略價值，但不願為此與印尼直接對立。

### 三 經濟關係

在經濟方面，蘇聯建議對印尼提供援助，印尼總統蘇哈托也要求與蘇聯共產集團有更多的貿易關係，但實際上進展緩慢。印尼已拒絕蘇聯協助完成以前所擱置的兩項建廠工程(見前)，印尼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關係也沒有得到適當的發展<sup>①</sup>。蘇印貿易在一九六九年與一九七〇年稍有增加，一九七一年開始減少，而一九七二年與一九七三年更急轉直下，一九七四年較前略有起色。蘇聯與印尼的貿易額在蘇聯整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很小，即以蘇聯對開發中國家的貿易而論，一九七四年蘇聯對印尼貿易為二千八百萬盧布，與該年蘇聯對埃及(七億二千八百萬盧布)、蘇聯對印度(六億一千五百萬盧布)、蘇聯對伊朗(四億九千六百萬盧布)及蘇聯對伊拉克(四億五千三百萬盧布)等國家的貿易額相比，仍屬微不足道。(蘇聯對印尼的貿易如附表)

蘇聯對印尼輸入輸出貿易總值表

	輸入	輸出	貿易總值	備註
一九六〇年	二八	一五	四三	單位：百萬 盧布
一九六五年	二九	四九	七八	
一九七〇年	二五	四	二九	
一九七一年	一〇·一	一〇·一	二〇·二	
一九七三年	四	三	七	
一九七四年	二〇	八	二八	

資料來源：一九七五年七月聯合國統計月報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July 1975)。

一九七一年的貿易額係根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第十二期蘇聯「對外貿易」(Veshniia Torgovia)月刊所發表的統計數字。

一九七四年，蘇印經濟關係有改善的跡象。是年三月廿三日，蘇聯副外長I. Grishin與印尼外長馬立克在雅加達簽訂一項新貿易協定。在此協定下，印尼從蘇聯輸入水泥、築路機、化學產品、光學儀器、藥品與交通設備；蘇聯則自印尼輸入橡膠、椰乾、胡椒、皮革、礦產、藝術品及手工藝品。馬立克稱「此協定的簽訂在雙邊關係上開創了新的一頁。」Grishin則謂「這協定的簽訂將為未來兩國貿易與經濟關係發展奠下新的基礎。」<sup>②</sup>

一九七四年春，蘇聯開闢由莫斯科經德里、曼谷與新加坡至雅加達的定期航線。

一九七五年六月，蘇聯工商業協會第一次參加印尼在雅加達舉行的商品展覽會，蘇聯在此展覽會中設立了一個資料中心，展出商品圖片、飛機模型及拖拉機模型等。

另一個重大的發展是印尼與蘇聯及東歐國家建立經技合作關係。一九七四年六月，印尼總統蘇哈托及外長馬立克召見印尼駐蘇聯及東歐的大使，說明印尼擬尋求與這些國家發展經濟關係，包括外援的可能性。七月間，馬立克率領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與北韓討論上述問題。十二月下旬，馬立克再度訪問東歐，這次行程除包括東德與匈牙利外，還訪問了蘇聯。並與蘇聯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簽訂一項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三月馬立克三度訪問東歐，行程包括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捷克。并與捷克簽訂了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

一九七五年六月卅日至七月二日，印尼總統蘇哈托訪問南斯拉夫，外長馬立克等隨行。此行除就一般國際情勢交換意見外，主要為商討兩國間經濟關係。

印尼此項政策上轉變，可歸因於：第一，在政治上欲恢復(最少在某種程度上)一個「獨立與積極」的對外政策；第二，急欲獲得外援。印尼外長馬立克在去年十二月下旬訪問蘇聯前夕聲稱：「印尼政府目前實行旨在擴大國家對外關係的方針。印尼現在主動發展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就是這一過程的反映。」<sup>③</sup>對蘇聯共產集團而言，這是與印尼擴展關係的有利條件，蘇聯及其東歐附庸也積極而小心地利用此一新機會。

蘇聯攻擊「多國投資集團」(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n Indonesia, 以美、日投資最多)控制了印尼的經濟，以離開印尼與西方的關係。

例如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莫斯科電台評論說：「西方國家無興趣提供印尼發展國家工業的機會，以便使印尼在經濟方面繼續依賴西方。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三十億美元外資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投資在礦產、森林、紡織與食品工業（石油方面的投資不包括在內）。外國公司在這些方面所獲得的利潤率每年約達百分之二十五。」另外一方面，蘇聯更盡力直接爭取印尼。例如蘇聯「新時代」週刊宣傳說：「現在印尼愈益開始覺悟，在現在的世界單只面向世界的一面是不能生存的。在國際舞台上印尼的經濟、貿易與其他關係愈廣闊及多面化，則印尼得到的利益愈大。例如，印尼總統蘇哈托不止一次的說，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印尼不但與西方，而且也與社會主義國家維持及發展關係。」它並稱：「印尼與蘇聯平等、互利關係的發展是符合兩國的利益與亞洲和平的需要的。」<sup>⑭</sup>

#### 四 結語

印支半島劇變後，美國應泰國要求逐步從泰撤軍，而且美國也逐漸減少駐非美軍，蘇聯與毛共均欲乘機向東南亞伸張勢力。赫爾辛基「歐洲安全合作會議」舉行後，蘇聯的注意力本已轉向亞洲，曾向日本及東南亞國家大力推銷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的相繼與毛共建交，更促使蘇聯加緊其向東南亞前進的步驟。

印尼地廣人多，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能源危機發生後，盛產石油的印尼利用這一優越條件提高了它在國際上的地位。蘇聯對這一東南亞最大的國家當然也想極力爭取。今年八月十七日為印尼獨立三十週年紀念日，蘇聯「消息報」在一篇文章中公開表示：「在不干涉內政、平等與互利原則的基礎上，蘇聯準備與印尼發展全面關係。」<sup>⑮</sup>

在蘇印建交的二十五年中（印尼與蘇聯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建交），雙方關係曾從高潮轉入低潮，但從目前演變情勢看來，兩國關係（尤其是經濟關係）顯然已在改善中。雖然如此，印尼對蘇聯還是深懷戒心的，印尼電台就曾警告說：「蘇聯與毛共在圖謀稱霸亞洲時只把我們當作抵押品，當這兩方衝突時，我們將首當其衝。下一個越南戰爭不可能發生在美國與共產集團之間，而可能發生在毛共與蘇聯之間。」<sup>⑯</sup>

註① 這位蘇聯大使為 Volkov，在出任駐印尼大使前曾任駐泰國大使。

「九、卅政變」後蘇聯與印尼之關係

一九七二年秋 Kuznetsov 接 Volkov 任蘇聯駐印尼大使。

註② A. Yuriev, 「印尼政治趨勢」, 蘇聯「新時代」(Novoye Vremya) 週刊, 四十九期,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二十三頁。

註③ 蘇聯「真理報」(Pravda), 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 第二版。

註④ Radio Moscow, June 9, 1973.

註⑤ Antara, June 30, 1973.

註⑥ 蘇聯「消息報」(Izvestia),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 第四版。

註⑦ Radio Jakarta, March 10, 1974.

註⑧ J.L.S. Girling, "Soviet Attitudes Towards South-East Asia", The World Today,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May 1973, p. 215.

註⑨ Trends and Highlights, Bangkok, Thailand,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May 1, 1972.

註⑩ Antara, Nov. 14, 1973.

註⑪ B. Vein, 「印尼的騷動」, 蘇聯「新時代」(Novoye Vremya) 週刊, 五十一期,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十五頁。

註⑫ Radio Jakarta, March 23, 1974.

註⑬ M. Momgatikh, 「印尼速寫」, 蘇聯「新時代」(Novoye Vremya) 週刊, 五十一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二十三頁。

註⑭ 同註⑬ 二十三頁。

註⑮ Yu. Lugovskoi, 「千島之國的佳節」, 「消息報」,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七日, 第二版。

註⑯ Intelligence Digest, England, October 1, 1975, p. 7.

## 中共延安時期之政治經驗

曹伯一著

全一冊新台幣貳佰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